



杨言洪 主编

外国语言文学

及

国别研究(二)

WAIGUO

YUYAN WENXUE

JI GUOBIE YANJIU



世界知识

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及国别研究 之二

主编：杨言洪

编委：杨言洪 李爱文 涂永彬
赵雪梅 朱 凯 葛铁鹰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语言文学及国别研究之二/ 杨言洪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012-2661-X

I. 外... II. 杨... III. ①语言学—外国—文集 ②文学
研究—外国—文集 ③文化学—外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908 号

书 名 外国语言文学及国别研究之二
Waiguo Yuyan Wenxue Ji Guobie Yanjiu Zhier

责任编辑 程 立 陈依尼

封面设计 孙 宁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小 寒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9¼ 印张 2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促进教育与科研相结合，体现大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两大功能，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从管理体制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自 2001 年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以来，校领导一再强调学校的工作要汇入“主流”。这就意味着要在搞好教学、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科研工作的投入，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以科研带动教学内容的更新，保证学科建设的创新与发展。同时要尽可能地让这些科研成果直接为社会服务，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为贯彻上述办学思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在积极探索教学管理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科研工作的力度，为汇入“主流”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发挥外语学院在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在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以及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等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所为平台，利用语种多，涵盖国家地区广泛，且大多数教师具有长期在对象国学习、工作等优势，开

拓了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并于2004年编辑出版了区域国别政治、经济、文化研究论文集《外国语言文学及国别研究》。

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本论文集，是外语学院的广大教师继2004年的论文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的又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对各国语言、文学、文化以及区域国别政治、经济研究的内容，不仅研究领域广泛，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

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以及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追求、不停止努力，我们的科研水平必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真正实现教学、科研汇入“主流”的目标。

编 者

2006年10月

目 录

《东方学》的语境及其文化立场	余玉萍	1
从《一千零一夜》看女奴文化	邹兰芳	12
摩洛哥经济形势分析	余 莉	28
也门经济发展与展望	杨建荣	38
丹斋申采浩文学文本批评	崔玉山	54
“韩流”对中国影视文化的影响	周玉波	77
表生物意义的俄语成语的语义类型	吴 君	92
论果戈理的讽刺与幽默艺术	刘贵友	105
社会保障——欧洲社会的稳定器	郑文彬	115
法语在欧盟中的地位	张 萍	134
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艺术的发展及其影响	刘宝义	140
中欧经贸关系简述	周晓幸	150
日本人姓名考	姚莉萍	162
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现状与思考	郭德玉	177
日本朱子学与德川幕府的统治	赵 敬	188
墨西哥联邦议会的职权与运作	杨仲林	197

4 外国语言文学及国别研究之二

意大利品牌设计与中小企业专区的启示	徐 映	209
意大利城市建筑文化的独立性	周莉莉	224
意大利美第奇家族银行的兴衰及其现实意义	张宇靖	232
新世纪越南经济的发展	聂 楦	244
WTO 体制下保障机制与我国保障机制的建立	田文泉	261
中国“信、达、雅”与西方“等效论”	谢思田	278

《东方学》的语境及其文化立场

余玉萍

【内容提要】在当代的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反响巨大的著作。萨义德的研究表明：所谓“东方学”，并非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学科，它包含了西方在表述东方时的特定思维方式及权力话语方式。在一些东西方读者眼里，《东方学》常被认为具有反西方论倾向。但是，如果从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话语体系盛行的语境出发，结合作者的特殊人生经历，则会发现《东方学》所持的始终是文化多元主义立场。

【关键词】东方学 西方中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

《东方学》的作者爱德华·萨义德，是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的知名学者、后殖民与后现代主义辩论的先锋，同时又是一位积极投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了解他的一生，对于阅读并领会其代表作《东方学》是有很大帮助的。

1935年，爱德华·萨义德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富商家庭。童年时期，爱德华·萨义德在家乡就学，1947年随家人迁至埃及首都开罗，完成中学教育。17岁后赴美接受高等教育，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63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1967年阿以战争中，阿拉伯人的失败

对爱德华·萨义德触动极大。此后，他开始从纯文学研究转向文学与社会、政治结合的研究领域。作为一名原籍巴勒斯坦的学者，他致力于在异国他乡（美国）用自己的笔触诠释巴勒斯坦问题，并尝试参与政治活动，1977年成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写成《东方学》一书，并出版发行。该书后来被译成26种语言，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杰出的代表作，同时被公认为20世纪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成型之作。此后不久，爱德华·萨义德又陆续写出《巴勒斯坦问题》（1979年）和《报道伊斯兰》（1981年），使三部书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1993年，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了又一部巨著《文化与帝国主义》，再次引起全球知识界的强烈反响。

在爱德华·萨义德出版的18部著作中，除了上述几部作品外，较为知名的还有《文学与社会》（1980年）、《世界、文本、批评家》（1983年）以及《流离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决的奋斗1969—1994》、《笔与剑》、《知识分子论》（1994年）。除此之外，他还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中举办了上百场讲座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内容多与中东问题相关。

在学术领域，爱德华·萨义德一生共获得数十个文学奖，是多个文学和学术组织的成员。在政治生活领域，尽管1991年爱德华·萨义德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辞职，但他依然以自己的方式，为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处的巴勒斯坦国而积极奔走，直至2003年9月因病去世。

二

对于不熟悉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读者而言，阅读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并非一件易事，原因或许在于书中所涉及的理论和术语过多，这也是该书在西方出版后5年内并未引起关注和争论的缘由之一。

本文试图绕过原著所包含的复杂理论和术语，从总体上把握爱德华·萨义德对于东方学的理解和认识。

什么是东方学（Orientalism）？萨义德认为这一词语应包括三层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前一种含义可归为纯粹的“学”，是基于事物本质的理论性认识和科学性阐释，后两种含义则已成为“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思想、宗旨和指导原则。萨义德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东方学的后两种含义。

作者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政治知识，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① 欧洲文化通过它处理和创造了一个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东方镜像。因此，采用“人文和政治的方式”（第36页）来分析和描述东方学兴起、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是合理的。

作者对本书的研究对象作了界定。其关注焦点的一方面限于英、法、美三国的东方学；另一方面，作者将东方学对东方的观察聚焦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因为“阿拉伯的近东，在此伊斯兰被认为是决定文化和民族特征的主要因素，英法两大殖民帝国与‘东方’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最为复杂，最为人们所熟知。”（第51页）

作者首先以英国和法国在近东、伊斯兰和阿拉伯地区的历史经验为主要依据，勾勒出东方学的基本轮廓。与其他学科不同，东方学是建立在地理概念之上的，包含所有与东方相关的研究领域。它最早可追溯至14世纪初维也纳基督教公会在大学里设立的有关东方语言的系列教席，后来研究范围慢慢扩大，18世纪时主要表现为圣经学、闪语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和汉学，19世纪中叶已发展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其间产生了许多东方学的重要著作。在这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页。本节对《东方学》的引用均出自此书，页码随文注出，不再加注。

个过程中,欧洲人以一种优越的视角评说东方,逐渐“发现自己具有包容东方和‘东方化东方’的能力”。(第83页)

18世纪后期,英国人对印度历史、宗教、梵文的研究,扩大了东方的地域范围,促成现代东方学的兴起。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则是现代东方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通过创立埃及研究院和组织撰写《埃及志》,借助西方对东方的知识和权力,拿破仑的入侵计划得以成功。这是东方学被直接用于殖民活动的首要典型案例。拿破仑远征又反过来引发了东方学更多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诞生,以及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地域政治方面,接踵而来的是苏伊士运河计划和英国1882年对埃及的占领。在这一系列征服活动中,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多次被验证,即东方首先被认识,然后被入侵和占领,接着被重新改造,被殖民者用东方化的话语来评判和统治。

19世纪是东方学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东方学发展了庞大的学术谱系,产生了众多的专业研究会和复杂的机构,并得到英法等殖民强国的物质支持。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东方学与政治密切联系,成为凌驾于东方之上的力量。在东方学的视线中,东方为西方而存在,而且是一成不变的。“西方是积极的行动者,东方则是消极的回应者。西方是东方人所有行为的目击者和审判者。”(第142页)

关于东方学的现状,作者主要探讨了20世纪东方学与英法大规模殖民活动的密切关系及其后来东方学在美国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东方学中的东方是一个表述系统,由一整套政治力量框定,并由之强行带入西方学术、西方意识和西方帝国之中。隐伏的东方学是一种无意识的、无法感触的确信,表现为对东方的理论观念和教条,其基本内容静止僵化,且世代相传,沉淀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东方被认为是怪异的、落后的、沉默的、被动的,远离进步,带有专制倾向;与西方相比,它是可征服的、劣等的他者。显现的东方学则表现为言语和行动,包括对东方各方面知

识的明确阐述，也包括东方学家思维中的政策取向。隐伏的东方学教条与显现的东方学描述之间的汇合是 20 世纪早期东方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式，它造就了一批个性主义的东方学家兼殖民帝国的代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充当殖民权威的角色。东方学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法成为西方的权力中心，东方学的中心也随之转移至美国，在新的语境中发生新的变化。美国东方学更多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来关注东方，对伊斯兰和阿拉伯的看法“沿袭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强烈的反伊斯兰情绪”。（第 368 页）阿拉伯人被描述为反西方、非理性、具威胁性、不诚实、不可信赖的群体。全面繁荣的区域研究和近东研究（或中东研究）由欧洲的东方研究传统转化而来，并体现了最纯粹的东方学信条。这些信条可简要概括为：其一，“理性、发达、人道、高级的西方，与离经叛道、不发达、低级的东方之间绝对的、系统的差异。”其二是“对东方的抽象概括”，特别是以“代表着古典东方文明的文本为基础”所作的概括，而忽略“来自现代东方社会的直接经验”。其三，“东方永恒如一，始终不变，没有能力界定自己”，因此“一套从西方的角度描述东方的高度概括和系统的词汇必不可少甚至有着科学的‘客观性’”。其四，“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第 385 页）由此，东方学成功地融入新帝国主义的思维与实践之中。

三

如前所述，《东方学》的问世使 20 世纪后殖民理论逐渐趋向成熟，由此开启了全球后殖民批评的热潮，并在西方学院知识分子和殖民地本土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学者们纷纷从后殖民文化的语境分析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以便从中汲取各种理论资

源和研究方法。

与此同时,《东方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来自东西方的批评和非议。20世纪整个80年代,西方学界对《东方学》的分析范围越来越广,以凸显其中论证的不周全和矛盾之处。譬如,对全书所论及的对象提出质疑,指出所谓“东方”并非整个东方,而仅仅是中东;所研究的东方学作品也并非来自整个欧洲,而局限于在中东有着传统殖民利益的法国、英国及后来者美国,因而观点有失偏颇。对此,爱德华·萨义德似乎早就意识到,因为他在《东方学》绪论中就做过解释,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也曾说过,他本人关于东方学的观点并非建立在整个东方研究的基础上,而是“限定在与殖民计划相联系的方面”。再譬如,对书中论点及方法论的质疑,指其动用了传统和现代的多种文化分析范式,却未能将之充分地综合与协调,使得论证过程经常出现难解的悖论和混乱。^①

相比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学者则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东方学》对于阐释真正的东方所作的贡献,当他们未能从书中寻求到答案之时便深感失望,抱怨作者仅仅是“利用西方当代理论在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塑造一个话语性的东方”,其后殖民理论无益于恢复阿拉伯世界的本来面目。^②萨义德则一再强调,出于反本质主义的观点,《东方学》的主题并非在于确定真正的东方,其主要目的“是描述一种特殊的观念体系,而绝不是试图用新的体系代替旧的体系。”(第418页)

不可忽视的是一些东方和西方读者所共有的感受,即认为《东方学》具有反西方论倾向。持此观点的西方读者和批评家不满于该书对但丁、福楼拜、内瓦尔等西方传统卓越人士所作的分析,对作者关于《东方学》所作的“政治的假定”深表质疑,认为书

① 参阅[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第二章,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王炎:《重新认识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中意识形态气息浓厚，显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敌视态度。为证明这一点，书中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因此有理由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第260页）这句话似乎还表明：竭力反对本质主义的萨义德在认为西方观察者本质上无法真诚地表现东方之时，自己也陷入本质主义之中。《文明和它的敌人》（*Civilization and Its Enemies*）一书的作者——美国学者李·哈里斯（Lee Harris）曾撰写专文，指出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种诡辩，“《东方学》建立在一个令人惊异的前提之上，即西方想象东方生活方式的尝试是错误的，因为西方的想象方式常常与东方的真实情形相左，所以呈现的是被扭曲的东方画面。”^① 该文认为，西方人以好奇之心观察和表述东方无可厚非，因为东方人对西方本也同样好奇；西方人在阐释东方时出现的错误亦可理解，因为西方在阐述自我时也并非样样正确。然而萨义德的《东方学》却以此为由贬斥西方人的东方研究，这不是在宣扬“只有东方人才能书写东方”的种族主义偏见吗？

假若萨义德在反对种族主义的东方学的同时，自身却步入种族主义的误区，那无疑是一种失败。萨义德显然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误解，他在《东方学》的末尾指出，东方学的失败并非简单地归为真正的东方与东方学家所表现的东方之间的差异，也并非由于东方学家大部分是西方人，因而对东方的本质难有内在的认识。“我当然不相信只有黑人才能书写黑人、只有穆斯林才能书写穆斯林之类不无偏狭的假设。”（第414页）东方学的失败，从根本上而言，属于方法论的失败。而这正是萨义德通过《东方学》着力证明的。

一段时期内，与西方批评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带有民族

^① Lee Harris: *Orientalism as Racism*, <http://www.techcentralstation.com/040804C.html>.

主义情绪的读者的喜悦之情。萨义德在1995年《东方学》再版时撰写的后记中写道：“我记得较早的阿拉伯人的一篇评论，将本书作者形容为阿拉伯主义的拥护者……他的使命是用一种英雄的、浪漫的方式与西方权威徒手格斗。这尽管有些夸张，但确实表达了阿拉伯人长期遭受西方敌视而产生的某种真实情感。”^① 萨义德认为，阿拉伯世界的激进反应来源于长期的失落和挫折，同时是学术和文化生活中缺乏民主的体现。无论如何，这仍属于一种误读。他强调：“我从不以为自己在助长政治和文化上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敌意。我只是描述这种敌意的形成，试图减轻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②

在《东方学》后记中，萨义德点明了自己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首先是认可文化差异的存在，其次是勇敢挑战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观念，正如其所言：“我的目的……并非是要抹杀差异本身——谁也不能否认民族和文化差异在人与人关系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而是要对这样一个观念提出挑战：差异意味着敌意，意味着一对僵化而又具体的对立的本质，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整个敌对的知识体系。”^③ 因此，任何偏颇的观念，包括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来自任何一方的种族主义、乃至无限放大的民族主义都是应该摒弃的。

2003年，企鹅出版社出版新版《东方学》，爱德华·萨义德为之撰写了序言。借此机会，他再次强调：“比起那种被制造出来的文明冲突，我们更应该将精力集中于各文化间交流、互鉴、共存的缓慢进程。但是，对于这种更为广阔的理解，我们需要时间，在深信最终将达成解释一致性的支持下，进行耐心而充满质疑的探究。

①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不是东方》，《天涯》1997年第4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而这在一个要求即时行动和即时反应的世界中是很难持续的。”^①

萨义德坚信自己是出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写作《东方学》的，这种立场在后来的又一部巨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萨义德在写作《东方学》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萨义德并不避讳这一点，在回应英美学界的批判时说道：“《东方学》是一带有倾向性的著作，而非一部理论的机器。”（第437页）而这一倾向性与该书的具体语境是分不开的。具体地说，若干世纪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话语体系的盛行，构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压倒性的文化态势，造成东西方文化间的巨大鸿沟。对此，跨越两种文化背景的萨义德有着更深切感受。他生长于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自小便具有所谓“东方人”意识，后客居美国，对于东方人，尤其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政治上所受到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去国离乡的流亡生活使他逐渐将自我定位为一名“业余者”、“圈外人”，一位敢于对权势说真话、以边缘话语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的知识分子。这一切都促使他在研究东方学的相关文本时，采取社会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立场，着重于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从根本上去解构文化霸权所虚设的“东方神话”，以求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僵硬对抗模式，达到平等对话、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

在剖析《东方学》的特殊语境时，我们不应忽视该书与作者一生所致力巴勒斯坦事业的密切联系。最终促使萨义德走出学院派生活圈子的是1967年的阿以战争。在那次战争中，由于交战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等诸多原因，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世界丢失了大量领土，因而经历了巨大的动荡。身在美国的萨义德从远处观察了这场战争，感受着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人的耻辱，开始考虑将自己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与所关注的民族、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历时5年，于1978年完成的《东方学》显然是一次成功的突破。其后，

^① 转引自《the Guardian》，2003年8月2日。

萨义德在直接参与政治的同时，接连写出《巴勒斯坦问题》和《报道伊斯兰》，揭示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媒体的东方主义策略所掩盖的事实真相，与《东方学》构成“三部曲”。在《巴勒斯坦问题》中，萨义德承袭《东方学》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提出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论点。总的说来，《东方学》研究的是一般问题，后两部著作关注的是历史个案，但《东方学》在研究上的偏重加深了彼此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全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萨义德因其《东方学》被视为一种新理论的开拓者。至于阿拉伯世界的评论，则常常将萨义德与其为巴勒斯坦所作的不懈努力紧密相连。在2003年萨义德逝世之际，多家阿拉伯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他是一代阿拉伯学者中无人能及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他能从属于个人和民族的问题中抽取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道德内涵，由此引起世界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读者群的共鸣。与此同时，阿拉伯评论界对他在当代美国社会环境下反对犹太种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其一生致力于反对殖民、专制和压迫，呼吁人权、民主和社会公正，为巴勒斯坦问题积极奔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说：“我认为他的逝世不仅对文学批评，而且对巴勒斯坦事业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客观看法在世界各地都赢得了巨大的尊敬。”^①此外，更有学者认为，将《东方学》与阿以冲突、巴以冲突的环境紧密联系，是正确理解这一宏大巨著的关键所在。倘若如此，“我们便不能指责爱德华·萨义德的反东方学立场，学院派的东方学家也不能指责他在研究方法上的薄弱、资料信息上的缺陷、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以及主观主义的运用。”^②

① 《爱德华·萨义德——巴勒斯坦作家》，《阿拉伯逊旺》月刊，2004年7月号。

② 阿卜杜·哈米德·萨利赫·罕丹：《爱德华·萨义德和东方学界》，埃及《金字塔报》，2003年10月12日。